

一名政法记者的追踪与守望

张振华

“你天天扎在那些案子里，受得了吗？就不怕影响身心？”身边熟悉我工作的朋友，不止一次皱着眉这样问我。

坦白说，跑了这么多年重案一线，我不是没有过情绪波动的时刻。那些直指人性幽暗的案件细节，那些被命运击碎的人生轨迹，曾无数次在深夜里萦绕不散，给我带来难以言说的压抑与沉重。

作为一名常年深入一线的政法记者，我见过太多人性的复杂。我曾在案卷里凝视过触目惊心的解剖照片，指尖划过那些散落一地的新型毒品与冰冷仪器；我曾与被告人家属的哭诉声里，触摸过那种天塌地陷的绝望，也见证过人性中最偏执的仇、最扭曲的恨。

但我同样见过绝境里的守望——是85岁老人枯瘦手掌里紧攥的寻人启事，是孩童眼里未曾熄灭的期待；见过黑暗中的曙光——是民警熬红的双眼，是检察官案头堆叠的善宗，也感受过人心底最纯粹的善、最动人的美、最炽热的爱、最坚定的光。

不可否认，每次与那些罪犯直面相对，我都像一尾离水的鱼，被沉闷的压抑与窒息的绝望裹挟着，连喘口气都觉得艰难。所以，每次采访结束，我都要一头扎进最热闹的市井中——人声鼎沸的超市，烟火缭绕的菜市场。听售货员热情的叫卖声，闻瓜果蔬菜混着泥土的清香，看锅碗瓢盆的光泽，听推着购物车的夫妻低声说笑，看蹒跚学步的孩子攥着糖纸奔跑。这热腾腾的人间烟火，总能一点点熨帖我被冰冷案件刺痛的心脏，把我从无边的黑暗里，拽回鲜活的尘世。

书评

余秋雨在其《藏书忧》一文中，写出了时光在莠后的水流花谢：“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，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种更大的担忧渐渐从心底升起——我死了之后，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？”可见，藏书者身后万卷佳册的去向，是一个绕不开也躲不过的话题。对此，著名出版人俞晓群先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。在其新著《书房的晚景》中，既有《藏书的乐趣》《书房中的诗意》这样暖意浓浓的文字，也有《书房中的思念》《书房的慰藉》等忆往怀旧的篇什，还有《经典不厌百回读》《你一定要读传记》等授人以渔的经验之谈。读者阅读时，仿佛置身于他的书房之中，聆听一位阅尽千帆的书界前辈，将他多年来的思考与感悟娓娓道来。

虽同为时间概念，但书房的“晚景”显然不同于“夜景”。在俞晓群眼中，晚景不同于夜景，

我清楚地知道，我是一名政法记者。如果沉溺于黑暗无法自拔，如果失去了审视黑暗、追寻光明的勇气，又怎能用笔下的文字，给那些身处阴霾的人带去力量？又怎能对得起那些负重前行、燃尽自己照亮前路的政法干警？

所以，在我的报道里，除了揭露罪恶、还原真相，我总想着多做一点——把那些散落在黑暗里的人性微光，一点点捡拾起来，写给自己看，也写给读者看。我想告诉他们：纵使长夜漫漫，也总有星光点点；纵使前路坎坷，也总有勇气可寻。

以白银案为例，从2016年8月第一次跟踪报道该案，到《白银案实录》付梓出版，再到一次次往返白银走访，直至2025年岁末深冬，一晃已近十个春秋。这些年来，我往返白银十三次，累计在这座城市停留了一百多个日夜。

当年，为了采访到办案民警、检察官，以及案件相关当事人，我联系了从部委到省厅、市局，再到看守所的各个部门，反复沟通协调，耗费了大量心力。那些熬夜整理的访谈记录，成了我人生里最沉甸甸的印记。

在跟踪报道这起案件的日子里，我有大半年时间漂泊在外。女儿出生的前一天，我才踩着夜色匆匆从采访地赶回家；她出生的第二天，我又背着行囊，踏上了奔赴白银的征程。女儿满月那天，我站在城河村后面的黄河滩上，凛冽的风卷着泥沙，狠狠拍打在脸上，生疼。我想起襁褓中的女儿，想着该送她一件什么样的满月礼物。看着河滩上被黄河水打磨得温润光滑的石头，我弯腰捡起一块，紧紧攥在手

心，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一点点漫进心底。我想，就把这块石头带回家吧，等女儿糖糖长大了，把石头送给她，再给她讲白银案水落石出的全过程。我要告诉她，那些年爸爸去了哪里，在做什么；我要告诉她，白银案的告破，不仅是对被害者的告慰，更向所有人证明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无论罪恶藏得多深，逃得多远，时间有多长，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

今年，我的女儿糖糖已经8岁了。这个读三年级的小姑娘，认真地读完了我写的《白银案实录》，逢人便骄傲地推荐：“这个书，是我爸爸写的，我爸爸是一名政法记者。”每逢记者节，她都会画一幅画送给我——画上有红旗，有爸爸，有她，还有一颗闪闪发光的红星和一顶帽子。

2019年1月3日，白银案的元凶高承勇被执行死刑。回望这起公安部一号督办大案，它不仅是对犯罪者的终极审判，也是对政法干警执法司法能力的严峻考验，更是对全社会的一次深刻警示——平安的背后，是无数政法人员默默无闻地坚守与付出。我深信，历史一定会记住那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，那些在守护正义、捍卫平安的征程中挺身而出的无名英雄们……

这起案件同样启示我们：当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人员潜藏于社会中时，每个人都有可能面临潜在危险。从客观现实来看，我们无法百分百侦破所有案件。即便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，也无法挽回已然逝去的生命。相较于事后追责，做好事前预防才是根本性目标。如何预防？关键在于

天南海北的爱书人手中，堪称完满结局。但更多时候，我们所耳闻目睹的是，大量藏书在书房主理人百年之后，被当作废纸论斤卖掉，甚至直接化为纸浆烟消云散，这难免令人怅惘。诚如俞晓群在《书房的晚景》中所言：“其实我们为之哀伤的，只是一个书生从生到死，与书房相伴相依的

书房晚景亦生辉

周洋

必然宿命。”由此看来，书房的晚景这样的题目，并非人人皆可拿来做一篇文章。首先，作者本人必得拥有宏富之藏书，深知淘书、买书、藏书、散书之韵味。其次，与读书、藏书等领域需有广泛的交往，饱览书界风景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要和那些家藏万卷的文化老人时相往还，亲身经历过藏书的聚散，才会



城河村后面的黄河滩。

深入研判恶性犯罪人员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轨迹，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构建起坚实的防范体系。

在一线采访的这些年，我的收获早已远超文字本身。和办案人员相处的日子，对我而言是一场深刻的职业洗礼。无论是办案民警通宵研判的专注，还是检察官唇枪舌剑的坚定，抑或是法官敲响法槌时的肃穆，都让我一次又一次燃起内心的信念与激情。

我深深懂得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需要有人投身于一份需要坚守的事业，都需要有人秉持于种担当精神，走出一条不同于俗常的道路。很多时候，正是这份滚烫的信念，让我们在世俗的纷乱里，唤醒内心的责任感与事业激情，对抗迷茫，找回自我。

如今，我与白银这座戈壁上的小城之间早已产生了一份难以

有深切的体察与反思。而俞晓群可谓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他二十来岁就进入出版行业，从普通编辑成长为大名鼎鼎的出版家，策划过的精品丛书、图书不可胜数，个人藏书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皆可圈可点。

俞晓群毕业于数学专业，他进入出版行业后，特别善于从前辈名家那里得到教益。在入职之

初，他曾接触到从事数学教育与数学史研究的梁宗巨先生。老先生家中的书房是一间围绕数学史研究拓展开来的主题书房，他在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完成学术专著《世界数学通史》。为了加快写作进度，他不断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，通宵达旦，笔耕不辍，最后索性在书房里放置一张小木床，累了困了，就在小木床上休

言说的羁绊。我触摸过它尘封的过往，凝视过它鲜活的当下，更笃信它充满希望的未来。令人感动的是，在这桩冰冷案件背后，人间的暖意从未被凛冬冰封。无数平凡的人们，依旧怀揣着最朴素的善良，以虔诚之心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温度。

当晨光刺破厚重的云层，悲伤会被时光沉淀为平静，痛苦也会在岁月里渐渐结痂。当春天来临，白银的大街小巷，各色花儿如约绽放，粉的、白的，缀满枝头，这是生命最蓬勃的宣言；商厦楼宇间，大人们的谈笑声、孩子们的嬉闹声交织成网，织就了市井最鲜活的烟火气。当清晨的阳光落在街角的石凳上，落在老人下棋的棋盘上，落在孩童奔跑的脚步里，一切都是崭新而充满希望的模样。

息。终于，梁宗巨先生在72岁时著成这部大书的上半部，可就在他准备好全部资料，向着下半部书稿发起冲刺的当口，却溘然长逝，徒留遗憾。后来，他的学术资料由两位弟子接手，遵循其治学风格，最终将这部大作的下半部编写完成。“梁先生书房中的那一张小木床，就在我的头脑中刻下一生难忘的印记”，这幅真真切切的书房晚景画面，想必对俞晓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——“直到我六十几岁整理书房时，也曾经把自己的床铺摆到书架旁，希望像梁先生那样，每天读书写作累了，就在书房中安睡。”

读罢全书，掩卷沉思，我不仅没有因为书名中的“晚景”二字感到消沉、失落，相反，从俞晓群以及他所尊敬的老先生们那里，学到了读书的诀窍和治学的门径，更有一种全身心归向书房沉潜钻研的紧迫感、奋进感。除了认同他提出的“劝君惜取老年时”之外，我更觉书房里的书生要惜取少年时、青年时、中年时，因为书房的生活就是心灵的生活，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心灵。

文苑笔谈

官员考课是历代吏治的核心议题。以唐代为例，其官员考课制度有明确的规范：每年一小考，累积四年考绩后，进行一大考。大考，是决定官员升迁或黜降的关键依据。每位接受考核的官员，最终都会拿到一份记载其考核等第的文件——“考牒”。

唐代考课官员主要依据的标准是“四善”和“二十七最”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为官道德品行标准为“四善”：“一曰德义有闻，二曰清慎明著，三曰公平可称，四曰恪勤匪懈。”侧重对官员个人道德修养的考核。“二十七最”则是针对不同类别的官员，规定其在所属机构履职尽责的最佳标准：“格遵补阙，为近侍之最；经衡人物，擢英才良，为选司之最；兵士调习，戎装无备，为督领之最；推鞠得情，处断平允，为法官之最；训导有方，生徒充业，为学官之最；赏罚严明，攻战必胜，为将帅之最；访察精审，弹举必当，为判正之最”等，侧重考核官员的行政管理能力与专业履职水平。

根据“四善”和“二十七最”的考课标准，各级考课官要严格根据考课标准，评定考课等级，共有九个等级。《大唐新语》中记载了一则流传千古的典故，描写了一位仁慈而开明的考课官形象，更诞生了“宽辱不惊”这一成语。据说，考功员外郎卢承庆在考察官员时，发现一名负责督运漕粮的官员，因为途中遇到风浪，船上的大米遭受损失。他考之曰：“监运损粮，考中下。”获知这个结果，那位官员神态自若，一言不发地退下。卢承庆见他不计较一时得失，颇有些雅量，于是提笔在他的考牒上改了等第：“非力所及，考中中。”令人意外的是，那位官员得知考第上调后，既不喜形于色，也没有半句逢迎之言。卢承庆见状，不由得心生敬佩，再次修改考第，批注曰：“宽辱不惊，考中上。”这一典故既让“宽辱不惊”成为形容人胸襟豁达、不因得失而动心的常用成语，也让后世得以窥见唐代考课制度的运行细节。其他官员无不称赞卢承庆的“弘恕”，但从制度层面审视，这也体现了考官的主观意志对考课结果的直接影响。

开元十八年(公元730年)，随着官吏人数的不断增加，朝廷财政不堪重负。唐玄宗有意改革官僚体制的积弊，下旨令宰相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，负责铨选与考课制度改革。裴光庭推行“循资格”制度，核心是以年资为擢用官吏的条件，不论才能高低，只要资历满限就可擢升。这种只强调年资、不重视能力的选拔方法，虽招致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，却也得到大批能力不佳或久居下僚的官员的拥护。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年资成为官员擢升的重要标准。事实上，官员仅有年资，没有考牒佐证考绩，老本也是吃不下去的。如何兼顾年资、考绩与才能，综合选拔官员，依然是一个难题。

考绩结果与官员的仕途命运休戚相关。考绩优良者，得以升迁加禄；考绩低劣者，则难逃贬官、减禄、免官、除名。唐代对官员的惩罚，主要依照两条原则：一是基本不科以真刑，也就是优先减免实刑，适当地议、请、减、赎和官当。二是予以除免，即除名、免官、免所居官(免除其一个官职，保留其他官职)。除名是所有惩罚中最严厉的一种，所有官职、爵号一概被剥夺，需等待六年后，方可重新通过铨叙获取为官“出身”资格。

唐代法律规定，如果官员犯有应被流放的罪行，且无宽恕理由，就必须执行流配。流罪一般有三等，即二千里、二千五百里、三千里(指流配之所与京城的距离)。然而在具体执行时，往往不限于里程，主要目的是将罪犯发往荒凉的地方。犯罪的官员大多不愿前去，便故意拖延时间，企图逃避。因唐代平均每两三大赦，就被贬的官员在流放途中恰好遇到大赦，就能得到赦免或减刑，如果已到达流配目的地，便无法赦免或减刑，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。唐律对此也有明确规定，不仅明确禁止拖延行为，还对行程的速度、启程和到任的时间以及押领人员的职责等予以详细规定。押领官员若纵容流放者拖延，或未按规定督办行程，在考课中会被评为下等，面临减禄甚至贬官的惩处；反之，押领官员若严格履职，则可将其作为考绩优良的佐证。

考课制度对司法官员的约束尤为直接，“二十七最”中“推鞠得情，处断平允”的“法官之最”标准，正是司法官员考课的核心依据。《大唐新语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唐临担任大理寺卿时，曾审理一批死刑囚犯。有十数名因连坐拟判死刑者，此前皆由其他官员审结。恰好唐高宗来到大理寺，亲自审讯牢内囚徒，其他官员所判的死刑纷纷喊冤，唯有唐临所判的囚因无一入喊冤。唐高宗觉得有些奇怪，当即追问缘由。囚犯回答：“唐卿断案公正无枉，所以我早已绝意了。”唐高宗赞叹唐临的公正，“断案判刑，就应该如此啊！”随后，唐高宗将唐临升为御史大夫，唐高宗亲自为他作出考词：“形若死灰，心如铁石。”这份考词正是对唐临司法政绩的认可，也是其考课等次优异的直接体现，最终促成了他的升迁。

考课标准的导向性，甚至会影响司法实践的宽严尺度。唐太宗曾经问大理寺卿刘德威：“近来刑网稍密，是什么原因？”刘德威直言，根源在于君主。律文规定：失入(过失错判)减三等处罚，失出(过失轻判)减五等处罚。如今却是反过来了，失入无辜，失出则会获罪，所以官吏为了自保，判案时更为严苛，谁会愿意因为过失轻判而获罪呢？唐太宗听后，马上采取措施，先是宣布“入减三等，出减五等”的条文必须严格执行，随即强调死刑五复奏制度。二者相辅相成，既纠正了司法裁量的失衡，也为官员践行“公平可称”的考课标准扫清了障碍，从制度层面解决了“刑网颇密”的问题。

一个官员的优劣，并不是仅靠考绩的条条框框就能完全衡量的，就像那位宽辱不惊的漕运官，其胸襟气度难以用考第等级来定义。然而，考绩又有其必要性，它既是维系吏治秩序的重要抓手，也是规范司法、刑罚执行等要务的标尺，值得深入研究。

唐朝官员衡才定等皆有标尺

陈益



《素食者》

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作家韩江，表彰她“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，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”。韩江最广为人知的小说便是《素食者》，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？主人公英惠因为做了一场有关杀戮的噩梦，便选择不再吃肉，成为一名素食者。在韩江的笔下，这个本来很

简单的故事围绕英惠的丈夫、姐夫、姐姐三个人的视角层层铺开，英惠的过去、遭遇和结局渐渐呈现，缠绕得令人窒息。

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，韩江提及创作《素食者》期间为之困惑与痛苦的问题：“一个人可能成为全然纯洁的存在吗？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拒绝暴力？我们拒绝从属于人类这个物种会发生什么？”

拒绝暴力是韩江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。暴力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？它的边界又在哪里？除了肢体、语言、精神暴力，暴力是否还披有更为隐蔽的外衣？无爱、冷漠、拒绝沟通、偏心、期待等，所有能造成伤害的行为是否都是一种暴力，只不过严重或是细微、明显或是隐藏而已？或许，很多以爱之名实施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裹挟了未为人知的暴力，我们均是暴力的实施者、受害者链条上的其中一个纽结——认识到暴力的多样性，是打破暴力的第一步。

“我们中间横亘着刀”，这句话道破了暴力的本质。暴力就是

横亘在人们之间的那把刀。英惠的一生都笼罩在暴力之下，她从小就被父亲的暴力之刀砍得伤痕累累。小说中，英惠的父亲是一个用摩托车绑着狗一圈又一圈骑行，直到狗吐血累死的残暴之人，一个随便对子女动粗，硬把肉塞到英惠口中强迫她吃下并用巴掌的父权代表。很难想象，在父亲日复一日的暴力中长大的英惠，会留下怎样无法愈合的伤口。

结婚后，英惠又生活在丈夫自私无爱的冷暴力中。她的丈夫之所以选择和她结婚，只是因为他需要一个平凡，且能够像保姆一样照顾他生活的妻子。他对她没有丝毫的爱意和关心，在英惠不断做噩梦、整夜失眠的日子里，他从来没有关心过她，在乎的只有他自己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。最终，他选择和妻子离婚。冷漠无情何尝不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隐形之刀？这把刀横亘在夫妻之间，慢慢割出一个无法跨越的深渊。长期处在这样冰冷的婚姻关系中，英惠就像行走在长长的黑暗隧道中，看不到一点亮光，感受不到一丝温暖。

不再吃肉是英惠逃离一切暴力的潜意识选择，然而却发展成她母亲所说的“你现在不吃肉，全世界的人就会把你吃掉”的悲惨结局。英惠选择以自毁的极端方式拒绝暴力，她幻想自己变成了一棵树，拒绝进食，拒绝存活，所以她被人认为已经“疯了”。英惠是真的疯了，还是只是被人认为疯了？正常和疯癫的界限又该如何定义？符合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就是正常，不符合的就是异类，甚至被界定为疯癫吗？或许，她只是不愿再向充满暴力的世界妥协。正常与疯癫的界限，不该由多数人的行为模式来定义。

跟英惠一样在暴力中长大的姐姐仁惠，则选择成为别人认为的“正常人”，她开店养家，照顾丈夫和小孩，照顾被送进精神医院的妹妹。但是在这些正常行为的背后，没人看到和在意的她内心的苦苦挣扎，她觉得“自己在很早以前就已死去，现在不过跟幽灵一样”“始终觉得那个深不见底的伤口正在张着大嘴要把自己吞噬掉”。如果说英惠属于被写到极

致的小说主角，那仁惠则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的映照。但最终，在英惠的坚持下，姐姐终于理解了她，阻止了为英惠插胃管的医生和护士，不再强迫英惠吃任何东西。而生命逐渐走向枯竭的英惠，仿佛得到了灵魂的滋养，周身散发着一种平和的气息——理解，打破了暴力的桎梏。

韩江除了将英惠的故事写得触目惊心，也深刻地塑造了仁惠、姐夫等角色，将人性的复杂、黑暗、罪恶、挣扎、脆弱、不可救赎写得淋漓尽致。韩江被评价为“能把细节用到尽头的作家”，她用最平实的语言将一个简单故事写得震撼人心，这便是《素食者》的独到之处。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所说，韩江的每本书都在做文体试验。她带着问题和思索进行写作，将问题以一种残酷的方式予以深度解剖，却不负责提供答案。也许，很多问题的答案，其实就在每个人的心中。愿每一个在生活中挣扎的人，都能在遭遇黑暗后依然坚守内心的光明，最终挣脱暴力的枷锁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与救赎。